

杜甫秦州诗题咏的丝绸之路说解

刘雁翔 王小风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 甘肃 天水 741001)

(天水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 甘肃 天水 741001)

摘要: 唐代的秦州是陇右一大都会, 人口稠密, 经济发达。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流寓秦州三月之久, 成诗90余首, 吟咏所及, 时见驿道(丝绸之路)、驿使诗作或诗句, 而历代杜诗注多不得要领。以史证诗, 则会发现杜诗所咏既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丝绸之路中道、也有其南缘丝绸之路南道, 还涉及张骞穷河源、张骞乘槎等中国地理探险大课题。而弄清了杜诗题咏的历史地理背景, 则可还原杜诗题咏驿道的“深意”、充分理解杜诗的“诗史”韵味, 同时有助于领略唐代丝绸之路的风情。

关键词: 秦州诗 杜甫 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2010)04-0054-11

据《元和郡县图志》, 唐代的秦州辖上邽、伏羌、陇城、清水、成纪五县, 州治上邽。^①和现行政区划对照, 其辖区大致和今甘肃天水市相当。为有唐一代陇右大都会, 人口稠密, 经济发达。史念海先生《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对此有透彻的论述:

经过大震关至鄯州的通西域道路上的都会, 要数秦州和风翔府, 这一州一府分列陇山东西, 都相当繁荣, 都各有其独特之处。

秦州于天宝年间有户两万四千余, 不仅超过了凉州, 更远非鄯州可比, 应该是陇右道中的第一大州。^②

说到底, 秦州的“大”、秦州的“相当繁荣”都是由交通位置即其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决定的。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秋天, 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 西行逾陇, 流寓秦州。吟咏所及, 登临抒怀、咏物思人之外, 尚多有描绘山川地貌、民情风俗的诗

收稿日期: 2010-07-15

作者简介: 刘雁翔(1964-), 甘肃武山人,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地域文化研究。王小风(1969-),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主要从事地域文化、唐代诗歌研究。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年, 第980页。

② 史念海《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 《唐代历史地理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第365-367页。

句，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称颂《秦州杂诗二十首》言“山川城郭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是矣。”^①催生秦州成为大都市的丝绸之路当然更是他题咏的对象。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说“杜翁秦州诸诗屡次涉及使驿，盖秦州为西北通安西、北庭，西通河、鄯，西南通岷、洮、松州之总枢纽，故使臣驿骑繁忙也。”^②而历代注家对杜诗涉及的驿使和丝绸之路（驿道）的注解，或专注训诂、无关痛痒，或引经据典、离题万里，所以非常有必要予以廓清，以还原杜诗题咏的“深意”，以充分理解杜诗的“诗史”韵味，以领略丝绸之路的风情。

一、‘驿道出流沙’和‘万里流沙道’

杜甫《秦州杂诗》之三有句“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秦州诗《东楼》有句“万里流沙道，西行过此门。”所谓“驿道出流沙”即驿道通于流沙，和“万里流沙道”一样都是指由长安东来，越陇山，过秦州，再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

北宋杜诗注，如《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等以“流沙，地名”或“西域地名”注之，^③黄希、黄鹤《补注杜诗》注为“流沙，即书所谓西被于流沙。”^④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注为“后汉志，居延泽，古流沙，献帝立为西海郡。”^⑤以流沙为地名或西域地名在大方向上没错，但到底是何地名，不清楚。说明“王状元”注、郭知达注对“流沙”所指终究不清楚。《尚书·禹贡》有句：“东渐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此即黄氏注所言“流沙，即书所谓西被于流沙也”的依据，实际上《尚书》是言九州西部的疆域覆盖流沙荒漠之地，属于模糊语。《尚书·禹贡》又有句“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这样古人就有了一种固定认识——弱水所入之地唤作流沙无疑，于是《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条有言“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此即蔡梦弼注“后汉志，居延泽，古流沙，献帝立为西海郡”的依据。其逻辑是既然弱水余波入于流沙，而居延泽正是弱水注入泽，必是流沙无疑。实际上弱水“余波入于流沙”是说弱水没于荒漠之中，和杜诗的“流沙”是无任何关联的。到了明代，钱兼益独辟蹊径，以史证诗，其《钱注杜诗》引《唐六典》为“驿道出流沙”注，曰“六典，陇右道东接秦州，西逾流沙。”

①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854页。

②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66页。

③ [唐]杜甫撰，[清]王十明集注《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第9卷，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郭知达集注《九家集注杜诗》，《四库全书》第10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9页。

④ 黄希原注、黄鹤补注《补注杜诗》，《四库全书》第1069册，第388页。

⑤ 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3-524页。

注曰,流沙在沙州北,连延数千里。”^①此后清代的杜诗注随声附和,尽皆援引之,而个别字词省略,如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注为“唐六典,陇右道东接秦州,西逾流沙。流沙在沙州北,连延数千里。”^②推其源,钱注语出《唐六典·尚书户部》^③,钱兼益援引不错,不过,应作“六曰陇右道……东接秦州,西逾流沙。”才算忠实原文。朱鹤龄注将《唐六典》的自注混同于原文就不太地道了。

今人作注,以为旧注事出史籍,因循转引。其实,“东接秦州,西逾流沙”是描述陇右道幅员辽阔而言的,并非是指专指交通。《唐六典》的自注“流沙在沙州北,连延数千里”道出了实情,可惜未有人追根问底,弄明白“在沙州北,连延数千里”的流沙到底是何地。按诗意,“驿道出流沙”意在极言沟通西域驿道之漫长,是说驿道都通往流沙、经过流沙了。至于“万里流沙道”,宋以来旧注多以为乃通吐蕃之道或吐蕃所居之地,不确!当然此道经由临州(今甘肃临洮)或兰州(今甘肃兰州)可达吐蕃据有的河湟地区,但这是岔道,诗意旨在歌咏连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主干道。杜甫《高都护骢马行》有句“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④是言安西都护高仙芝威震西域,功成名就,朝廷招致还长安修养。而高“飘飘远自流沙至”所行正是“万里流沙道”,只不过是向西向东罢了。总之,“驿道出流沙”、“万里流沙道”是同一条道——过秦州、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大道。这从另外一些咏及西域的唐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如:来济《出玉关》之“今日流沙外,垂涕念生还”、刘言史《病僧二首》之“竺国乡程算不回,病中衣锡遍浮埃。如今汉地诸经本,自过流沙远背来”、高适《送裴别将之安西》之“地出流沙外,天长甲子西”、处默《送僧游西域》之“一盂兼一锡,只此度流沙”、周存《西戎献马》之“影别流沙路,嘶流上苑风”;再如杜甫《送从弟亚赴安西判官》之“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八哀诗·赠司空王公思礼》之“服事哥舒翰,意无流沙碛”。可见无论是西域求法的僧人、还是西域任职的官吏或由西域而来的贡物都是要经流沙道来往。至于《东楼》所咏“万里流沙道”何而“西行过此门”,《杜诗详注》言:“(东)楼当驿道,故征西者皆过此门,”^⑤其说甚是。秦州城处藉河河谷,川道狭窄,受这种特殊地形的影响,秦州城从来都是呈东西长扁的矩形状,而贯穿全城的主街也就正对东西城门,直到清朝还是这种格局。所以,西行之人当然是要东门进而西门出了。

在论定了杜诗“驿道”和“流沙道”就是汉代以来连同中土和西域的丝绸之路主干道之后,接下来我们再依据相关资料对长安至安西间的重要城市和名关险隘做一列举:长安→凤翔(今陕西凤翔)→陇州(今陕西陇县)→陇山→大震关→秦州→渭州

① [唐]杜甫著,[清]钱兼益笺注《钱注杜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2页。

② 朱鹤龄辑注,韩成武等点校《杜工部诗集辑注》,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6页。

③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8页。

④ 本诗及下文未注出处的唐人诗作均出自《全唐诗》。

⑤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01页。

(今甘肃陇西)→高城岭→临州(今甘肃临洮)→兰州→金城关→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瓜州(今甘肃瓜州)→沙州(今甘肃敦煌)→玉门关→莫贺延碛→伊州(今新疆哈密)→大患鬼魅碛→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交河(吐鲁番西,一度为安西都护府所在地,由交河向北可达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庭州)→铁门关(新疆库尔勒)→龟兹(新疆库车县,唐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如严耕望先生言“此驿道由安西都护府东经凉州,至长安,虽甘州以西多行沙碛,乏水草,多风险;然行旅不绝,商业交通甚盛,不但为唐室控制西域中亚之大孔道,亦为国际贸易、文化交流之大动脉。”^①唐玄奘西行求法,岑参西行安西都护府供职走的就是此道。兹摘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片段以领略杜诗所咏“万里流沙道”的悠长与艰险,并判定“流沙”确指之地。

贞观三年秋八月……时年二十六也。时有秦州僧孝达在京学《涅槃经》,功毕还乡,遂与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兰州伴,又随去至兰州。一宿,遇凉州人送官马归,又随去至彼。停月余日……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时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既奉严敕,防禁特切……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闻之愁愤,所乘之马又死,不知计出,沉默经月余……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从此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不复能进,遂卧沙中默念观音,虽困不舍。……至第五夜半,忽有凉风触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马亦能起。体既苏息,得少睡眠。即于睡中梦一大神长数丈,执戟麾曰:“何不强行,而更卧也。”法师惊寤进发,行可十里,马忽异路,制之不回。经数里,忽见青草数亩,下马恣食。去草十步欲回转,又到一池,水甘澄镜澈,下而就饮,身命重全,人马俱得苏息……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后日盛水,取草进发,更经两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②

由此可知玄奘离京西行,有秦州僧人孝达陪伴,且在丝绸之路重镇秦州住过一宿。由此也可知,杜诗“驿道出流沙”和“万里流沙道”所咏的“流沙”正是玉门关和伊吾即伊州之间的大沙碛(沙河)莫贺延碛即今之哈顺戈壁。是为“西域”的起点,又是大

①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494-495页。

② 杜斗城《陇右高僧录》“玄奘”,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5-271页。

沙碛，正好可代表通西域道路之艰险，于是唐代诗文涉及西域道路，动辄有“流沙”字样。天宝十三载（754），岑参赴北庭都护府度莫贺延碛，对此流沙道有切身体会，其《日没贺延碛作》云“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①

二、“从天此路回”

《秦州杂诗》之八有句“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诗句所咏依旧是秦州驿道即过往秦州的丝绸之路，不言秦州而秦州自在诗内。下面我们依次对此四句诗做一说解，以探究“从天此路回”之“路”所指者何。

先说寻源使。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备极艰辛，北道出使，南道而回，两遭匈奴扣留，13年后方才还朝（前139—前126）。虽因大夏安于现状未完成“断匈奴右臂”的使命，但带回诸多有关西域的信息，大大扩展了汉王朝的地理视野。其最引人注目的是认定和田河上游是黄河之源，如《史记·大宛列传》言：“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这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后人便将出使西域的使者称寻源使。对于这件事情的原委，陈桥驿先生《水经注记载的异地同名》有详尽解说：

昆仑山从一座神话中的山岳成为一座实有的山岳，为时在公元一二六年以后的汉武帝时代。根据《大宛列传》所记“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山云。”这里所说的汉使是张骞，天子当然指汉武帝。这里所谓河源，实际上就是现在塔里木河支流之一和田河的上源。至于这个错误是由张骞造成的，抑或当时当地确有这样的传说，那就不得而知。但总是张骞把这个错误传出来的。而汉武帝对照古图书，就这样把今和田河源所出的山岳名为昆仑山。至于当时所案的是些什么图书，司马迁是了解事情始末的。他说：“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山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这实际上就是清末李慈铭所说的“自《山海经》有河出昆仑一语，于是张骞凿空而汉武帝求之于阗葱岭矣。”^②

“从天此路回”之“天”可以理解为天上，也可理解为天际或天涯。在古人的观念中，河源是通天的，具体的说就是连通天河的，至少唐代以前有一种观念是这样。李白《将进酒》有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浪淘沙》云：“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是说九曲黄河自天而来，如逆流而上，就能通达天河，拜访善良勤劳的牵牛织女一家。既然认定

① [唐]岑参著，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41页。

② 陈桥驿《水经注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49页。

河源通天，那么寻源之人一定到了天上，自然从天而来的。总之，“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两句是说：听说当年出使西域的使者完成寻源使命之后，从遥远的天际回来就是经过此路再到长安的。

再说“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句。诸解沿用宋人旧说，公认“牵牛”典出西晋张华《博物志》所载乘槎泛海上天的传说故事。《博物志》早佚，于这段故事，诸注家所引字句亦不尽相同，这里采用《全唐诗典故词典》转引如下：“旧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查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①固然，这则离奇的故事中有“牵牛”字样，但直接借此以释“牵牛去几许”未免牵强。杜甫将“牵牛”和“宛马”对举，和张骞挂上钩，完全是因为此故事在流传过程中，那个原本无名无姓的乘槎探险者不知不觉被换成了张骞，无名英雄成了有名英雄。据学者研究，今人可见张骞乘槎寻河源的故事最早的版本源自南朝萧梁之宗懔《荆楚岁时记》。^②同时代的诗人庾肩吾、庾信父子也有相关的诗作。庾肩吾《奉使江州舟中七夕诗》有云“九江逢七夕，初弦值早秋。天河来映水，织女欲攀舟。汉使俱为客，星槎共逐流。莫言相送浦，不及穿针楼。”^③庾信《七夕》有云：“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隔河相望近，经秋离别赊。愁将今夕恨，复著明年花。”^④诗中有“牵牛”、“织女”，也有“汉使”即寻源使，也就是张骞。可证在南朝萧梁之前，张骞乘槎寻访河源直达天河、与牵牛（牛郎）织女会面故事已完全形成。既如此，“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就好理解了。原来“寻源使”“从天”“牵牛”“宛马”所言皆是一人一事——即张骞通西域、寻河源。诗人的逻辑是，秦州驿道连通张骞出使的西域，而远在西域河源连通天河，则很自然就由寻源使而联想到天，由天联想到天河，而天河又联想到牵牛织女之故事。至于“牵牛去几许”的设问，句型和《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相类，是说家住天河的牵牛抬头即见，但时间上、空间上都距我们非常遥远，按字面理解，是说牵牛到底距我们有多远啊。而“宛马至今来”是说异域的佳品如西域大宛国的良马“宛马”等物依然源源不断的通过“此路”（秦州驿道）输入中土。汉武帝太初四年

① 范之麟、吴康舜主编《全唐诗典故辞典》，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592页。

② 郑阿财《敦煌文献中〈张骞乘槎〉故事之探讨》，《法商学报》1986年第21期第425-433页；陶喻之《张骞乘槎故事源流考》，《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2期；邓绍基《典实和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阴山学刊》1995年第1期第8-13页。

③ 逯钦立辑校《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995页。

④ [南朝]徐陵编，穆宏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0页。

(前107年)得大宛国汗血马,武帝名之曰天马,作《天马歌》有云“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①“涉流沙”正是过秦州的“万里流沙道”。如果得其意而望其形,则知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牵牛距我们是那么的遥远,梦幻飘渺,亦即张骞的寻源伟业已成为历史,而当世芸芸众生依旧受用西域涌来的奇珍异品。昔人已去,功业长存。

关于河源自何,既是地理问题,也是中华文化史的大课题,在此有必要稍微深究一下。《尚书·禹贡》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是说黄河流经积石,河源并不具体。接下来就有了《山海经》的河出昆仑说“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渤海。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其实“敦薨”就是“薨敦”指的还是“昆仑”,而昆仑也就是“混沌”。^②由此可见河源昆仑之“昆仑”其隐喻意就是不清不楚、糊里糊涂,《山海经》等典籍的河源之地昆仑山是在《禹贡》“导河积石”基础上幻想的结果。张骞出使西域,带来了河源新说,汉武帝钦定他认为的河源之地和田河所出之山为昆仑山。到了东汉,《汉书·西域传》又在张骞倡导的河源之外,加上葱岭(帕米尔高原)河源。“西域……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出,一出于阾。于阾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认为昆仑、葱岭二源合一,向东流注蒲昌海(罗布泊),而后南向潜流由积石山重新冒出。黄河伏流重源说确立,也为大家接受,如地理学名著《水经注》就因袭这一观点。^③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实力强劲,实际控制地域扩展。隋大业五年(609),隋炀帝亲征吐谷浑,所置新郡之一名河源郡(今青海兴海东南),表明当时已基本确认河源之地在今青海境内。唐贞观九年(635),太宗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分道征讨吐谷浑,其中侯君集、李道宗一路“历破逻真谷,逾汉哭山,经途二千余里,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频与虏遇,皆大克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④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⑤星宿川即星宿海,地在今青海曲麻莱县麻多乡境内;柏海即今青海扎陵湖。上引两条资料足以说明唐人官方意识已抛弃了河源西域的伏流重源说,认定今青海星宿川为河源之地。长庆元年(821),大理寺卿刘元鼎出

① 《汉书》卷22《礼乐志》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60页。

② 叶舒宪、萧兵、郑在书《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2-904页。

③ 陈桥驿《〈水经注〉记载的黄河》,《邠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9-190页。

④ 《旧唐书》卷69《侯君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10页。

⑤ 《旧唐书》卷196《吐蕃》上,第5221页。

使吐蕃，有《使吐蕃经见纪略》^①，以亲历见闻描述了河源山川风土，最终形成唐人的河源星宿川说。可以判定，在杜甫生活的盛唐时代，知识界，至少博雅君子理应知晓河源西域的伏流重源说乃是谬说，而以民间传奇故事形式流传的张骞乘槎寻河源说仍然有相当的市场，且比正宗的河源星宿川说更为人们喜闻乐见。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初唐）即有张骞出使西域壁画，敦煌写本P.3910《新合孝经皇帝感辞》插有一段咏张骞寻河源、遇西王母、见牛郎织女の辞曲；另，S.5547《前汉刘家太子传》也插有一段张骞奉使寻河源、西王母赠支几石的故事；另，敦煌写本《古贤集》亦有歌咏张骞寻河的诗句，有云“张骞奉使寻河路，王母乘龙戴宝华。叹念阎浮汉武帝，赍粮奉命度流沙。谁见牵牛别织女，唯闻海客镇乘槎。”^②敦煌一隅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张骞乘槎寻河源故事在唐代流传的广远。以诗证诗，《全唐诗》收有咏及张骞的诗作多首，其中就有张骞乘槎寻河源典故，如胡曾《咏史诗·黄河》之“博望沉埋不复旋，黄河依旧水茫然。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得灵槎送上天”、薛能《黄河》之“人间无博望，谁复到穷源”、廖融《梦仙谣》之“星稀犹倚虹桥立，拟就张骞搭汉槎”、唐彦谦《蒲津河亭》之“烟横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钱珝《江行无题一百首》之“难逢星汉使，乌鹊日乘槎”、韦庄《夏口行寄婺州诸弟》之“谁道我随张博望，悠悠空外泛仙槎”等。杜甫对张骞凿空西域、一使寻源的功业推崇备至，诗中多次为其大唱赞歌。如《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之“讨胡愁李广，奉使待张骞”、《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之“伏柱闻周史，乘槎有汉臣”、《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之“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张骞”、《有感五首》“乘槎断消息，无处觅张骞”、《秋兴八首》“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等。杜甫乃“读书破万卷”的大师级诗人，对河源问题他没有就实而就虚，不采用河源星宿川正说，言之凿凿以张骞为乘槎寻河的主角，完全是诗情需要，诗作感染力需要。任何时候传说都要比史实更加生动，在诗人看来推高英雄人物并神化之是必须的，似乎只有神化张骞才能彻底突出其功业。宋元以降，人们对河源的认识进一步明确，明洪武十五年（1382），宗泐和尚奉使西藏，途径河源地区，有《望河源》诗曰“汉使穷河源，要领殊未得。遂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国”。^③耻笑归耻笑，而张骞乘槎的故事依旧频频出现在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之中，诗文戏曲之外尚用于瓷器、玉器、金银器等の装饰纹样，至而地名、人名也用此典故。张骞乘槎，一则雅俗共赏、耐人玩味の仙话。张骞寻河源、乘槎上天，会见西王母、牛郎织女一千仙人的故事情趣盎然，“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的诗句自然也是情趣盎然了。

① 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文见《全唐文》卷71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360-7361页。

② 郑阿财《敦煌文献中〈张骞乘槎〉故事之探讨》，《法商学报》1986年第21期，第425-433页。

③ 胡阿祥、彭安玉主编《中国地理大发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三、“弱水应无地，阳关已近天”

除以上直接吟咏驿道的诗作之外，杜甫秦州诗还有一首间接咏驿道的诗作——《送人从军》：“弱水应无地，阳关已近天。今君渡沙碛，累月断人烟。好武宁论命，封侯不计年。马寒防失道，雪没锦鞍鞯。”诗题为“送人”但笔墨更多的是落在了从军道路之艰难上，而从军之路正好就是过往秦州的丝绸之路。杜甫流寓秦州的乾元二年（759）正当吐蕃气焰嚣张之时，唐廷为应对危难局面，临时征兵发往西北要塞以加强防务，于是就有了“送人从军”的一幕。此诗有句涉及“路”，此路又和我们说解过的“驿道出流沙”、“万里流沙道”、“从天此路回”的“路”有所不同，歌咏的对象当是出阳关西域境内的丝绸之路南道。试做说解。

关于“弱水应无地，阳关已近天”。弱水，《尚书·禹贡》有载，也是《禹贡》中唯一西流之水。据顾颉刚、刘起釞《尚书校释译论》：“综诸家考述，大抵获知弱水发源于今甘肃山丹县焉支山西麓，穷石之东，西北流至张掖，合来自祁连山之羌谷水后，亦称张掖河。继向西北流，经今高台县，过合黎山西南，亦称合黎水。经合黎峡口折而向北流，经酒泉东的金塔县东北，过巴丹吉林沙漠西部，即所谓‘入于流沙’，最后东北入于居延海”。^①无地，《杜诗镜铨》：“应无地，谓当地尽处。”^②即地之尽头。岑参《过碛》有云“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可佐证。《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条“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弱水在大秦西（古罗马国）当是谬说，但将“日所入”和弱水联系起来，也可说明弱水就在天边地尽头。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中土之人看来，有流沙、弱水的西域当然是远在天边地尽头。阳关，“关名。在唐寿昌城西十里（一云六里）。东北距沙州城一百三十里。西汉武帝时置，为都尉治所，当敦煌通西域南路之要隘。晋及后魏置阳关县，北周废，唐置戍。今属敦煌县南湖乡古董滩。P. 5034 记其遗址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今已无存。因在玉门关之南，号曰阳关（P. 5034）。S. 5448《敦煌录》认为即故玉门关，又云其关后移州东。”^③《元和郡县图志》说“阳关，在（沙州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谓之南道，西趋鄯善、莎车。”^④近天，接近天边。又，岑参有诗“走马西来欲到天”。“已近天”和前一句“应无地”互为表里，同义，可解为“天边地尽头”，极言所戍之地之遥远，犹如“天涯海角”。

关于“今君渡沙碛，累月断人烟。好武宁论命，封侯不计年”。碛，沙漠砾漠之合

① 顾颉刚、刘起釞《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41页。

② 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6页。

③ 季羨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李正宇所撰词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99页。

④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第1027页。

称。《说文》：“磧，水渚中有石者。”即浅水中的沙石。由此，沙磧本身就有流沙之意。唐代，由敦煌通往西域的道路，多经玉门关、阳关西行，而不论是西出玉门关，或是西出阳关，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渡沙磧”。而西出阳关之路是遵循汉代通西域的南道而行，可达石城（汉楼兰）于阗等地。度南道“沙磧”的情况可通过一些西游高僧的传记见其梗概。《高僧法显传》说“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复与宝云等别敦煌。太守李浩供给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以。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①《高僧传》卷三《译经》：“（释智猛）出自阳关，西入流沙。凌危履险，有过前传。遂历鄯善、龟兹、于阗诸国，备瞻风化。”^②显然，此二高僧所走的正是西出阳关的丝绸之路南道，唐代依旧使用，所谓“流沙”正是“今君度沙磧”的“沙磧”。对此沙磧，《周书·异域》在记述鄯善国时捎带着有一段更详尽的描述，“鄯善，古楼兰国也。东去长安五千里。所治城方一里。地多沙卤，少水草。北即白龙堆路。魏太武时，为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欲至，唯老驼知之，即鸣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驶，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累月断人烟”有夸张的成分，但也是“沙磧”难度的真实反映。

封侯句用班超投笔从戎、立功西域典故，还是和“路”有瓜葛。《后汉书·班超传》“（班超）投笔叹曰‘大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

关于“马寒防失道，雪没锦鞍鞞”。西出阳关之道多险隘，春秋二季雪深，道路常常不通。诗之末尾两句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援引《沙洲地志》可证“一道南路，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里，其路由古阳关向沙州，多缘险隘，泉八所，皆有草。道险，不得夜行。春秋二时雪潦，道闭不通。”^③引文中的“镇”指石城镇，为汉代楼兰国，隋置鄯善镇，唐高宗上元二年置石城镇。资料所言是石城东入阳关之路，正乃“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丝绸之路南路，只是叙述的基点不同罢了。将“阳关已近天”和“雪没锦鞍鞞”联系起来看，“读书破万卷”的诗人通晓西域地理，是实写从军之人“渡沙磧”之难。在秦州虽是秋天，而在西域，当“胡天八月即飞雪”之时，所以有“马寒防失道，雪没锦鞍鞞”的叮嘱。鞞，马鞍垫子。鞍鞞一词，重心在鞍上，指的还是马鞍子。甘肃天水方言的“笔砚”指的其实是笔，并非笔和砚，理一也。

杜甫的秦州诗不但咏及丝绸之路，同时咏及驿使的繁忙、咏及丝绸之路风情物产……在诗圣笔下丝绸之路多姿多彩，令人神往。如咏驿使者有句“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稠迭多幽事，喧呼阅使星”、“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传声看驿使，

① 杜斗城《陇右高僧录》，第205页。

② 同上，第220页。

③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8页。

送节向河源”等；咏烽火者有句“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夕烽来不近，每日报平安……照秦通警急，过陇自艰难”、“烟火军中幕，牛羊岭上村”、“候火云峰峻，悬军幕井干”、“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等；咏丝路风情者有“降卤兼千帐，居人有万家。马骄朱汗落，羌舞白题斜”、“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羌妇语还笑，胡儿行且歌”、“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等；咏及丝路风物者有“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等。高尔泰《寻找家园·敦煌莫高窟》在追记丝路重镇敦煌的繁荣时说“想当年异国商贾云集，周边羌胡来归，毡庐千帐，土屋万家，鸣驼骄马，绿酒红裙，繁荣真如一梦。”^①由杜诗来看，以此比拟陇右的另一丝路重镇秦州也是恰如其分。天水市区南山石马坪遗存粟特人墓地，出土石棺床两具都可证唐代的秦州乃陇右国际性的大都会。

^① 高尔泰《寻找家园》，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年，第180页。